

“防艾”展现“制度关怀”

下调刷卡手续费 能提升消费吗

央行于近日下发通知,从2013年2月25日起下调银行卡刷卡手续费,费率总体下调幅度在23%至24%,其中餐饮娱乐类下调幅度高达37.5%。

下调银行卡手续费,既是降低银行总体过高收费水平的纠偏之举,也有通过交易费用下降刺激消费的战略考量。现行收费标准,从公益类刷卡消费到餐饮娱乐类消费,划分了0到4%四等收费费率,由商家支付。这对于中小商家来说,形成了不小的负担,在房租和人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趋势下,这种负担就更显沉重。商家减负只能通过两个办法:要么降低服务质量,要么通过加价向消费者转嫁。其结果,都是抑制正常消费需求。

降低刷卡费率,实质是通过银联和发卡行的部分让利,减轻商家和消费者负担,从而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先不说对于拉动消费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仅从调整社会商业利润分配,让更多实体而不仅是银行成为获利者的角度说,这也是早就进行的技术调整。短期看,银联和发卡行是利益出让方,但中长期看,银联和发卡行将同样获益:降低费率后刺激出来的刷卡热情,最终将形成增量的利润并返还给银行。下调费率的纠偏,不是一方损一方赢的零和游戏,其可能释放的“红利”,最终将使各方都受益。这就是改革的好处。

但是,即使纠偏能刺激出用卡热情,也不代表就能直接刺激出消费需求。消费需求首先建立在普遍的消费能力提升的基础上,而非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消费上。此次下调费率,餐饮娱乐类下调幅度最大,一般而言,这一消费领域受到的激励也应最大。但事实上,对于多数消费者而言,餐饮娱乐消费属于非日常消费,因此,其刺激作用对于消费者主体的导向作用未必有预期那么大。此外,越是消费额度大的餐饮娱乐消费,通常越是因公消费,而因公消费对于刷卡手续费率之类的价格因素并不敏感。因此,其消费惯性并不一定会随着价格导向的变化就发生变化,该消费的会照常消费,没有消费能力和机会的照样不会消费。

从减轻消费者负担的角度讲,可以更大幅度降低费率的领域应是日常消费领域。但是,必须消费的日常生活,既包括日常商品,也包括公用服务性支出。降低这类消费负担,意味着更复杂的博弈。这不是降低刷卡手续费这一项改革就可以完成的使命。因此,下调刷卡手续费对于提升消费需求的效用,并不会显著体现。

但是,降低刷卡消费仍然有足够的积极意义。最大的意义是提醒我们,在消费环节,还有许多类似银行刷卡手续费这样人为因素造成的消费障碍。如果说真正提升消费能力有赖于GDP的持续增长和“蛋糕”的更合理分配这两个复杂的结构性因素,需要长时期的战略布局的话,消除不合理费率这种人为制约消费的因素则要简单得多。把简单的先做了,这也是刺激消费的应有准备。其他不合理的收费,也因此需要尽早减省。徐立凡

据央视报道,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两家野味餐厅偷偷宰杀出售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猕猴,偷食大雁、野猪、竹鼠等野生动物,其中一家餐厅竟然挂着“抚州市公务消费定点商家”牌子。

江西野味馆 属于谁的盛宴

这是央视“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在行动”系列报道中出现的一幕。视频中那些残忍、血腥的杀戮画面,让人对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产生强烈质疑。特别是那家拥有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老板还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的野味店,看上去更像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现状的一种讽刺。在捕杀、收购、消费俨然形成一条龙服务的现实面前,法规似乎已无法阻止这群人的嗜血狂欢。

在舆论强烈关注下,两家野味店已停止营业,其中一个老板弃店逃跑。针对当地情况,国家林业局派出工作组、督导组,并向全国发出通知,将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据报道,资溪县林业局局长等4名相关责任官员已被免职。但在这场雷厉风行的整治行动中,不该忽略一个问题:其中一家餐厅为何挂着“公务消费定点商家”的牌子?倘若当地政府部门参与了这场消费野生动物的盛宴,这又说明什么?

当地政府部门有无在这家餐厅消费野味,目前尚未证实。资溪县“三公”办人员称,看到新闻说这家餐厅卖野味,也很气愤。既然这是一家以野味为卖点的餐厅,政府人员到那里难道只是吃素吗?何况,这家餐厅兜售野味,明明是抬眼就能看到的事情。相关部门授牌前,究竟有无实地察看?不允许商家有非法经营的行为,这是政府授牌的基本要求。可见,就算政府人员未在该店品尝野味,授予这家店为定点商家也已经是失职行为。

定点消费并非当地“土特产”,近年在全国许多地方均已实行。在这基础上实行公务卡结算,对减少“三公”浪费现象也具有一定成效。据悉,抚州市借助公务消费电子化监控系统,还可实时监控公款消费动态,使每一笔公务消费都有据可查。既然如此,这家违法商户为何能够进入定点名单,且未被及时发现?如果说,当地政府不应对商家的经营行为负责,至少也不能参与违法活动。当地政府部门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有必要进行追查。

必要在于加强监督公款消费的定点消费模式,结果却被一家野味馆给钻了进去。这也说明,单纯依赖定点消费等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规范“三公”消费。从制度设计上讲,定点消费等措施仍属于内部监督范畴。无论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其效果都可能因缺少外部监督而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化。因此,规范“三公”消费,还是要靠加快政府预算公开化改革,让“三公”消费无处躲藏。

毫无疑问,野生动物尤其不该摆上政府宴席,成为官员的盘中餐。倘若当地官员带头猛吃野味,又如何让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抱有信心?魏英杰

李克强主动倾听民间防艾人士和患者的意见建议,是一次“防艾首先倾听”的垂范;会议做出的多项部署,将会大大推进防艾工作。

两个星期前,民间组织“天津海河之星感染者关爱小组”负责人李虎,首发微博提及一位艾滋病患者因多家医院拒做手术而被迫篡改病历一事,经《新京报》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28日,包括李虎在内的13位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负责人和患者,坐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面,陈述各自的困难与建议。

一条微博经由媒体报道,引起李克强的关注,并推动个案问题的快速解决,这让李虎和民众感到欣慰;而更多防艾人士和患者能够和李克强直接对话,则让人增添了对未来防艾事业得以健康前行的信心。

的确,如何做好防艾工作,患者和防艾人士最有发言权。公众乃至决策者只有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坦诚交流,而不仅是“救助”的对象,才能谈得上更好的关怀、更准确的防治。但不

可否认,现实中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医务工作者对艾滋病患者“敬而远之”,直接影响防艾工作的效果。

在28日召开的这次防艾“草根会议”上,民间防艾人士和患者抢着与李克强“说话”,而国务院的另一个“官方会议”为此特意“让路”,推迟一个多小时召开,则是一次“防艾首先要学会倾听”的垂范,值得各地效仿。正如国务院“防艾委”的一位官员所说,以往一些官员和患者会面握手,体现的是一种“人道关怀”,而听取他们的“建议”,并作为防艾工作的决策参考,体现的则是“制度关怀”。

耐心倾听防艾人士和患者的心声,我们不难发现,防艾问题,确实不是简单的防治一种疾病,实际上更是一种社会问题的治理,考验着整个社会,尤其是决策者。防艾面临的很多困境,尤其是源于观念阻碍,更有体制机制上的不畅。比如,北京市康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就坦率地说,“困难”在于虽然是非营利性组织,不用缴所得税,却仍然要上缴营业税。这些

问题看似和防艾无关,实际影响社会参与的动力。

防艾不可能单靠政府,更需要全社会的配合。这次“草根会议”和“官方会议”的“碰撞”,产生了很多建设性的“火花”。比如,李克强提出,要考虑如何让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减轻负担,要研究成立支持社会组织的防艾基金,要研究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大病医保……这些建议都有针对性,如果能尽快开花结果,那对防艾工作的助力将不容忽。这些

这些年来,随着官方推动和民间努力,防艾的重要性已有共识。一定程度上,防艾工作的水准,检视着一个社会的人道情怀、社会组织的“健康状况”。但正如艾滋病病毒本身的传播方式也在演变,防艾工作会不断面临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切实关注艾滋病群体、随时倾听他们的声音,可以保证防艾工作有的放矢。期待这次会议的成果得以落实,同样期待这次会议展现的“倾听者姿态”,也能保持并得以复制。 维新

违规担保集资 无疑饮鸩止渴

正科级60万元,副科级20万元,普通职工5万元,年利息10%以上……这是江苏某地方政府向下属单位强行摊派的集资任务。

这样的做法,不仅在江苏,根据媒体曝光,近来云南、山东等多地出现县乡政府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借债”的事件,引起社会哗然。

照理而言,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获取财政资金,每年有预算决算,怎么来,怎么花,多少,都有个计划准数。可从这些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地方政府,更像是活跃于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者,以政府信用和财政作担保,开出高利率回报吸引甚至摊派集资任务,如饥似渴地追求现金收入,这意欲何为呢?要知道早在2009年,财政部就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正在发生的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严禁出现新的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

其实地方政府并不傻,当然知道这是违规行为,如果不是财政压力太大,他们断不会出此下策。他们追问的是,财政压力何以如此之大?大到让地方政府不惜违规去获取救命钱?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借来的钱,都用在先前已经开工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上,这是一个花钱极大的领域,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一动工,必须硬着头皮坚持到底,多少钱都得往里砸。

原因很简单,一旦功亏一篑,不但政绩没有了,还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政府形象且不论,指望通过城市建设抬升土地价格,借以增加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算盘也会落空,也正因此,“贷款一城建一卖地—还贷—城建”的“循环经济”,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

这种方式固然能够迅速改变城市形象,但是风险却极大,因为推进持续建设的动力,已经不再是现实的需求,而是对地价房价上涨的预期,这显然与赌博无疑,一旦经济放缓,楼市不景气,债务问题立刻就会显现,并且破坏力惊人。

而在政绩冲动面前,很多地方执政者不顾当地实际财力物力,用寅吃卯粮甚至饮鸩止渴的方式,盲目上大项目,因为征地开发,酿成了诸多社会矛盾。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征地矛盾是最主要的原因,这足应引起警惕。

这充分说明,以“土地财政”为依托的发展模式,不但风险巨大,而且不可持续,对于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更是重大的打击,这断不能成为政府的主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务,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尽快调整财税体制,优化考评机制,让发展的盲目冲动不再成为影响社会的长期健康成长的负面力量。 沐风

干露露母女无底线的炒作,早已沦为舆论一大笑料。她们的脱,她们的炒,她们的口无遮拦大放厥词,她们无下限的表演,一直是被人们当作小丑来看的。随着她们不断加码地制造噱头,人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这对堪称“极品”的母女,还能折腾出什么更出格、更出位的行为,去刺激已经有了严重审美疲劳的大众?

用眼投票“封杀”恶俗的千家母女

但是这一次,千家母女在江苏某电视台的表演,终于再次让人瞠目结舌。母女3人丑陋的表演,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三俗”来形容。她们不止是几个在公众的审美眼球中获利的小丑,更是使中国的娱乐圈越来越乌烟瘴气的毒瘤。

毫无羞耻感地脱出位,伸腿露肉,仅仅是让人鄙视;而在电视节目中如此谩骂、攻击和围殴提问者,毫无遮拦地传播错误价值观,赤裸裸地宣扬“不择手段出名就是牛×”的反道德价值观,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公开地展示出来,公开地嘲弄奋斗,公然地消解道德,理直气壮地以丑为美为荣,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舆论和公众继续以审丑的心态容忍这种下流的挑战和挑衅,公共空间将沦为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

请干露露母女红花人录节目的这家电视台,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请争议人物做节目,是如今很多电视台提升收视率常用的法宝,他们带着嗜血的狂热对待争议,根本没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一味地追求争议,不怕不争议,就怕争议得不到,没有争议甚至会制造争议渲染争议。找有争议的嘉宾,然后在节目中挑起冲突,让嘉宾们抬起来,能打起来就最好,打出血来就更亢奋了。节操和价值,在他们眼中都是浮云,眼中只有“看点”。争议人物不是不可以请,关键是“消费”这种争议,还是从争议中探讨和寻求一个深刻的问题?

无疑,凤姐和干露露母女这类娱乐“妖魔”,就是一个电视台畸形的收视观召唤出来的。这是一个逐丑的流程,电视台与小丑们在互相依附中互相强化,这些人越有名,刺激着更多人以出位更丑的方式走这条出名的终南捷径。

大众当然也有责任。没有围观者,没有消费者,没有三俗的需求,就没有三俗产品,也不会有这样的“极品”和“奇葩”招摇过市。干露露脱给谁?她们又是表演给谁的?她们击中的是谁的弱点,迎合的是谁的口味?这臭名昭著的大众文化下,形成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

如何走出这臭名昭著的恶性循环?有什么样的大众,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媒体和名人。我不赞成行政权力去封杀这类人,选择权在大众手中,公众应该用眼投票去“封杀”千家母女们。人们内心深处其实厌恶这些丑陋的表演,但厌恶不能仅停留在浅层的笑一笑或骂一骂,否则,厌恶感和愤怒感就会被利用。真正有力的批判,不只是道德上的批判,而是用眼投票让她们没有市场,让请她们上节目的电视台关门,拒绝围观她们的表演,让她们看到这天下作下流的炒作根本行不通。

公众应该用自己的眼球告诉干露露母女,请她们离开娱乐圈! 曹林

反对公务员录用查妇科



据《法制日报》报道,11月26日上午,湖北武汉10余名大学生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前玩起了“快闪”,诉求主题是反对现行女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此前一天下午,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落下帷幕。“要当公务员,不需妇科检”、“询问月经史,何关公务员”、学生们在现场举起这些标语。部分学生身穿自制的印有“不要公务员妇科体检”符号的裤衩,唱起了自编歌曲《体检自由风》,引起过往群众注意。 文/小强 图/春鸣

公务员辞职卖菜更应获得尊重

河南男子刘献炜曾考入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但后来放弃这份工作改卖蔬菜,他的父亲也因此与其不相往来。刘献炜说,当年放弃公务员,一是每天干的不是所学的;二是行政单位论资排辈,需要长时间苦等;三是亲戚朋友利用他的工作找他办事,不办得罪人,也没能力办。(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如此简单的人身自由,于个体来说却可能是种奢望。对于职业和成功,社会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并因此产生了固有

的偏见与傲慢,对求职者的志趣与爱好形成了裹挟与限制。心中希望的与现实选择完全背离,有选择彼的愿望,却未从事的勇气。受世俗的眼光、别人看法的影响,“我的职业我做主”几乎成了一种奢望。当职业被分为三六九等之后,成功的标准与路径也就变得极为逼仄而单调。或许,在本人看来,卖菜虽然辛苦,但却有着独特的快乐;然而,别人并不这么看,当别人挤破脑袋考公务员,将成为“体制内”的人作为最大的成功标准以及人生奋斗目标时,反向而行的做法,势必会让人难以理解,以至于产生了一种“父亲与其断绝来往”的悲情。能够承受辞职带来的重重压力,

“卖菜哥”需要极大的勇气来支撑。这样做,不是对困难的逃避,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以及职业取向的一种认真审视。一个人要快意生活、自由成长,其自主选择权就应当受到尊重。我们与国外的最大差距就在于,我们过度注重于人以外的东西,让物化而功利的东西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别人却恰恰相反,对于人的自由选择权的尊重,使个体所处的环境往往更加开放而包容。故此,即便是一个地铁流浪者,也往往表现出应有的从容与坦然、大度与豁达。没有身份的限制,没有职业的偏见,每一个人都有无拘无束的畅意。两相对照,公务员辞职卖菜就更值得称道。唐伟

法治登台,钉子户才能体面退场

近年来,类似的“钉子户”越来越多地映入眼帘。在北京朝阳区曙光西路上,曾有几栋房屋占道数十年之久,使市政干道在此处被迫“瘦身”;在江苏句容,因路中央的一栋楼房横亘不去,一条新修的六车道大马路无法正式开通。

从强拆到“不停水断电,不强行拆除”的承诺,相关部门的变化,展现了执法文明。“钉子户”虽然看起来不够壮观,但这个符号,折射着对法治的尊重。不过,围观之后,也不免生出一些忧思。如果温岭火车站前的马路开通,这家住户是否落实到位,其效果都可能因缺少外部监督而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化。因此,规范“三公”消费,还是要靠加快政府预算公开化改革,让“三公”消费无处躲藏。

毫无疑问,野生动物尤其不该摆上政府宴席,成为官员的盘中餐。倘若当地官员带头猛吃野味,又如何让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抱有信心?魏英杰

因不满拆迁补偿标准,浙江省温岭市一幢5层楼房突兀地矗立在火车站附近一条未完工的马路中间,被称为“最牛钉子户”。日前,当地政府表示,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不会停水断电,也不会强行拆除。

接拖住了马路开通的步伐。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难免发生冲突,选择搁置胜过选择对抗,而选择和解又强过选择搁置。如果说容忍“钉子户”体现了法治意识的自觉,那么积极寻求破解之道,才称得上深入法治肌理,彰显法治智慧。

“钉子户”的出现多是因为利益纠纷。比如,温岭这家住户就认为,其建房成本与补偿费用差得太。面对这种僵局,如何既保障补偿标准的公平性,又考虑个别“钉子户”的特殊性?在倡导法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理

念下,破除“钉子户”困局,更需要法治方式、机制创新、社会协同、利益救济等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

征地难、拆迁难,也是世界性难题,放眼发达国家,破解这一困局同样依赖于法律。媒体曾报道过美国因公共利益而征地的不少案例,征地一般要满足三个要件:一是确乎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二是对拆迁户提供公平补偿,三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很多国家都有“钉子户”,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往往是最佳方案。

“钉子户”困局绝非不可解开的死结。卢梭说过,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板上,而是铭记在人们的心中。面对“钉子户”日渐增多的现实,更需要提倡依法依规加以解决。法治登台了,“钉子户”才会体面退场。 王石川